清史研究前沿

编者按：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大都关涉政治改革和对外关系，对中国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本期所选两篇文章，第一篇重新探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得以进用的缘由，第二篇聚焦晚清英国对在华“英籍华民”是否拥有管辖权的问题，展现了晚清史研究对既有议题的深化和全球史的宏观视野。

翁同龢、张荫桓与戊戌康有为之进用

尚小明

[摘要] 不论翁同龢荐康说，还是张荫桓荐康说，都失之偏颇。事实上，丁酉冬至戊戌春，翁同龢出于变法考虑，曾向朝廷举荐康有为，并引起急于变法的光绪帝重视，反复令总署进呈康有为所上条陈及所著书籍，从而为后来康之进用做好了铺垫。在此过程中，与康关系密切的张荫桓也起了支持作用，但不是主角。随着戊戌春翁因不满康所著《孔子改制考》而与康疏远，光绪帝亦因翁不愿继续呈递康书及反对外交礼仪改革等与翁产生隔阂，于是重视西学、熟谙外务的张荫桓逐渐成为光绪帝推行变法最为倚重的大臣。“百日维新”开始后，由于翁被开缺，康的主要支持者已不是翁而是张。相比较而言，张对康的支持比翁对康的支持更隐秘一些，故康、梁后来叙述戊戌变法，更多及翁而绝少及张。

[关键词] 戊戌变法 光绪帝 康有为 翁同龢 张荫桓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2－0031－15

围绕康有为缘何在戊戌变法时期得以进用，数十年来逐渐形成两种看法：一种持翁同龢荐康说，[①] 另一种持张荫桓荐康说。[②] 产生分歧的原因，首先是相关史料记载简略、矛盾，甚至有人

[收稿日期] 2023-09-28

[作者简介] 尚小明（1968— ），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sxm@pku.edu.cn

① 相关成果主要有：罗惇汉：《谈翁同龢罢职事》，《读书通讯》第 29 期（1941 年）；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第 829-830 页；谢俊美：《翁同龢与戊戌变法》，《历史教学问题》1983 年第 6 期；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年，第 167-173 页；汤志钧：《翁同龢和帝党》，《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422-424 页；茅海建：《康有为与“弭兵会”——兼论翁同龢荐康有为说》，《清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等。

② 相关成果主要有：何炳棣：《张荫桓事迹》，《清华学报》第 13 卷第 1 期（1943 年）；范耀登：《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汕头大学学报》第 4 期（1992 年）；李吉奎：《张荫桓与戊戌变法》，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747-757 页；马忠文：《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欧阳跃峰：《张荫桓与康有为关系论辨》，《安徽史学》2012 年第 5 期；等。

为删改、虚构的情况，给研究者准确解读造成很大困难；其次是研究者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误区，即把两种说法对立起来，各持己见，排除了翁、张均对康有为进用起过作用的情形；最后则是研究者对光绪帝与翁、张关系的变化重视不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翁与康、张与康关系的判断。实际上，只要我们能够排除成见，实事求是，对史料进行更加精细的解读，这个问题依然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一、翁、康相识与康寄望翁主持变法落空

翁同龢最早知道康有为，当是光绪十四年（1888）秋。其时康有为到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他有感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欲通过国子监上书，请朝廷及时变法，遂写信给户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的翁同龢，想去拜访，但被拒绝。据翁十月十三日记："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① 大约半个月后，国子监祭酒盛昱拿了康有为的上书（即《上清帝第一书》）来见翁同龢，翁仍未答应代递，于十月廿七日记中写道："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② 虽然，翁不仅看了康的上书，还加以摘录，③ 对康留下了深刻印象，知道这是一个血气方刚、有理想抱负、敢于直言的读书人，同时也可以看出翁同龢对变法之事非常谨慎。

到了光绪二十年初夏，翁日记再次提及康有为，其时康已中举，于是年春到京参加恩科会试。翁五月初二日记："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④ 五月初五日又记："答康长素，未见。"⑤ 据此，康有为应是先写信给翁同龢，并呈上《新学伪经考》，希望与翁面谈。翁看过《新学伪经考》后，有信回复康有为，但没有答应见面。从翁以"野狐"二字评价康有为来看，《新学伪经考》独特的看法已完全超出了翁的认知，让其"惊诧不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二人见面，因认识上的差异，恐难平和交流，故不如避而不见。但从字里行间可以体察到，翁对康的才能隐约有一丝赞赏之意，因此，当是年七月给事中余联沅弹劾该书"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请毁版并禁广东士子从学时，⑥ 翁答应康门弟子梁启超通过张謇（翁同龢门生，甲午新科状元）发出的请求，"允周旋一切"。⑦

光绪二十一年春夏是翁、康开始接触交往的时期。是年春，康有为再次到京参加会试，适逢中日马关议和，康有为作为公车上书组织者之一，于四月初八日赴都察院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因和约已签，都察院未收。⑧ 旋康中二甲第四十八名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并未到署。翁对此特别关注，于四月十二日记："康祖诒亦中矣。"⑨ 五月初六日，康再次上书都察院，是为《上清帝第三书》。五月十一日，都察院代奏，翁看到了此次上书，并于其"随手记"中写下"都代康有为折数万言，条陈自强之策"等语。⑩ 五月十五日，

---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2232页。
②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2234–2235页。
③ 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晚清轶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第142–151页；汤志钧：《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
④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2696页。
⑤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697页。
⑥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8页。
⑦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1页。
⑧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69页。
⑨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01页。
⑩ 翁同龢：《随手记》，谢俊美编：《翁同龢集（增订本）》第4册，中华书局，2020年，第1846页。

军机处将康有为上书另缮一份，由翁同龢等当天与光绪帝见面时带去。[①]

康有为接连上书让其名声大噪，但在接下来近一个月中，翁日记并未见有关康有为的明确记载，只是在五月三十日记："南学诸生等寓书请见，拒未见。"[②] 闰五月初九日又记："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③] 李莼客即李慈铭，已于半年前去世，怎么可能此时又来翁处长谈？显然是翁在删改日记时粗心所致。萧一山很早就发现该处有问题，指出："李年较翁尤长一岁，已属宿耆，何得目为狂生？此李莼客之名，盖即康有为也。"[④] 孔祥吉则在仔细研究翁日记手稿本后，指出"南学诸生等"五字为挖补贴上去的，被挖去的文字"可能与康有为及变法人士有关"，"拒未见"三字疑为后来添写的；"李莼客"三字也是挖补贴上去的，该处原应为"康祖诒"或"康有为"。据此，孔祥吉推断：五月三十日"很可能是康有为上书请见，翁氏允诺后，才有闰五月初九日的翁、康正式见面"。[⑤] 这一判断得到学界普遍认同，但其实仍有疑问。据康有为自编年谱："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⑥] 则翁、康见面，翁实为主动。假如翁在五月三十日允诺与康见面的话，理应在当天或随后与康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那么，怎么还会出现翁"来访不遇"的情况呢？由此，笔者认为，"南学诸生等"五字虽然可能是挖补贴上去的，但挖掉的未必就是康有为，而应当是戊戌政变后受到处罚的其他维新人士。换言之，翁、康见面之前，康并没有于五月三十日上书请见，也不存在翁允诺见康之事，实情应是翁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贸然去访康，结果就出现了康所述"来访不遇"的情况。那么，翁是何时去见康的呢？查翁日记，闰五月初六日记云："未申间微雨……见起三刻，书房一刻余，再到直房，巳初二散。径入署，午正归。闲谈，无所事事。晚访王嵩隐颂蔚，此人有识力。"[⑦] 王颂蔚时为军机章京，住在"京师宣武坊南之醋章胡同"，[⑧] 属于城外，可知翁同龢当天下午曾出城；而康有为恰在一月前由东华门外烧酒胡同金顶庙迁至宣南米市胡同南海会馆，[⑨] 与王颂蔚住处很近。由此推断，翁同龢当天下午至晚上其实是要拜访康有为，结果"不遇"，于是就近拜访了王颂蔚。随后康得知翁曾来访，于闰五月初八日拟就《上清帝第四书》，[⑩] 然后于闰五月初九日到翁处，"就而谒之"。

翁见康主要是想探讨改革问题。康自编年谱记两人见面后情形道："常熟谢戊子（即光绪十四年——引者）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乃与论变法之事，反复讲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论治之书。时未知上之无权，面责常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常熟乃谓：'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吾乃始知宫中事。"[⑪]"与君虽新见"五字证实此前二人未曾见面，闰五月初九日是初见。"自未至酉"反复讲求变法之事，也与闰五月初九日记中"长谈"二字相符。从翁同龢主动访康"不遇"，到康有为"就而谒之"，讨论变法"大洽"，再到翁向康透露帝、后关系实情，可知两人关系在短时间内迅速升温，翁有变法之意，因而对康之才能很是欣赏，誉之为"策士"，康则对翁主持变法抱有期待，极力推动。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142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421 页。

②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5 册，第 2812 页。

③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5 册，第 2815 页。

④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4 册，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2094 页。

⑤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⑥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32 页。

⑦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5 册，第 2814 页。

⑧ 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自序》，王季烈纂：《江苏苏州莫厘王氏家谱》卷 17，民国二十六年石印本，第 58 页。

⑨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 61–62、105 页。

⑩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74 页。

⑪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32–133 页。

那么，康为何会把希望寄托在翁同龢身上呢？这与甲午战争前后朝局变化及翁的地位迅速上升密切相关。先是光绪二十年十月，上谕额勒和布与张之万两人退出军机处，[①] 补授翁同龢、李鸿藻、刚毅三人为军机大臣，十一月复授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②]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又将孙毓汶、徐用仪两位军机大臣分别开缺、罢值，而以钱应溥入值军机处。[③] 经此一番调整，“甲申易枢”所立中枢就只剩礼亲王世铎一人。调整后的军机大臣六人中，世铎、奕䜣、李鸿藻、钱应溥、刚毅五人，要么老迈不堪，体弱多病，要么不明外事，唯有翁同龢能力、资望皆适其选，一人而兼师傅、军机处、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均为要职，因此地位迅速上升。李鸿章的幕僚毕德格（美国人）称翁同龢为“总理大臣”，甚至告诉李提摩太说“翁同龢（总理大臣）事实上是中国的皇帝”；刚毅也对李提摩太说“自己没有能力对皇上施加什么影响，翁同龢垄断了所有信息……连那恭亲王和礼亲王都已成为了空架子”，并说翁同龢“一手遮天，事事把皇上蒙在鼓里，已经蒙蔽了他的眼睛”。[④] 这些说法不免有夸张成分，但甲午以后翁同龢权势大增确是事实。康有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看到翁同龢作为帝师有在毓庆宫独对的机会，认为这是推进改革的好时机，因此劝翁同龢曰：“公趁此举大事，不可失。若能行新政，废八股，则一月中新政甚多，公即去官可矣。”[⑤]

然而，翁虽有变法意愿，但身处政争漩涡，行事谨慎，魄力不足。比如康劝翁先变科举，翁也下定决心变法，曾令军机章京陈炽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又称“变法诏敕十二条”），准备实行。但他鉴于帝、后矛盾，深知光绪帝无权，因此畏惧太后，转而试图通过与奕䜣协商，争取奕䜣支持，不料奕䜣妒忌翁有独对权，不能与之同心，变法遂不果。[⑥] 迨翁被派总理衙门行走，“事殷多至夜分，自此不暇见士大夫，而一事不办”。康有为因此很不满，几次致书责翁，谓其“上不能保国，下不能保身”。[⑦] 陈炽也写信责翁“因循”。[⑧] 翁同龢令陈炽至康处代致歉意，但康以为“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矣”，[⑨] 对翁同龢不能排除阻力主持变法颇感失望。

既然推行变法一时无望，康有为遂在京师创刊《万国公报》，并创办强学会，致力于变法宣传工作。是年秋，深感“时事不可为”[⑩] 的康有为离开北京，仍回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著书，其与翁同龢的联系也暂时中断。

二、翁同龢从“荐康”到与康疏远

进入光绪二十二年后，翁同龢首先经历了一件大事，即毓庆宫书房的撤销。据文廷式记述：“丙申正月十三日，停止毓庆宫翁、孙（即孙家鼐——引者）两尚书入值，仍随时听传……以圣学有成，万机事繁故也。”[⑪] 翁亦记：“是日”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耶，抑暂

① 《清德宗实录》卷 352，光绪二十年十月壬戌。

② 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中华书局，2014 年，第 561、564 页。

③ 翁同龢：《松禅自订年谱》，谢俊美编：《翁同龢集（增订本）》第 4 册，第 1701 页。

④ 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陈义海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年，第 157、168 页。

⑤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35–136 页。

⑥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 133 页；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330 页。

⑦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33、136 页。

⑧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5 册，第 2831 页。

⑨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谢俊美编：《翁同龢集（增订本）》第 4 册第 133 页。

⑩ 王伯恭：《蜷庐随笔》（选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303 页。

⑪ 文廷式：《闻尘偶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44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24 页。

撤耶？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① 显然，这早在翁同龢预料之中。先是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即翁同龢担任军机大臣刚满一个月，慈禧太后就令补授奕䜣军机大臣，同时撤销满汉书房，虽然在翁同龢力争下汉书房得以暂时保留，② 但他应已看出慈禧太后不欲其权力过大，故当一年多后慈禧太后再找理由撤销毓庆宫书房时，翁便不再反对。这一变故或多或少对翁同龢与光绪帝的关系有所影响。当毓庆宫未撤时，翁在与诸军机大臣共同召对后，“凡有未尽之言，仍以毓庆宫进讲之时为密勿论思之地”；而自罢毓庆宫入值后，翁便不能经常在光绪帝前“陈其造膝之言”。③ 不过，从文廷式的记述来看，毓庆宫书房撤销后翁并没有完全失去独对机会，光绪帝仍可随时传他问话，因此他仍是可以对光绪帝产生重要影响的大臣。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康有为因为筹谋移民巴西之事再次进京，适逢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康遂拟《上清帝第五书》，除继续吁请变法外，还提出参加“弭兵会”的建议，谓“各国兵机已动，会议已纷，宜急派才望素重文臣辩士，分游各国，结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入其弭兵之会，散布议论，耸动英美，职以为用此对付，或可缓兵”。④ 关于上书情况，康自编年谱说：“适胶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书言事，工部长官淞溎读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不肯代递。又草三疏，交杨叔峤分交王幼遐、高理臣上之……既谒常熟，投以书告归。”⑤ 而与翁同龢一同负责对德交涉的张荫桓则说，康“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及康往而辞焉。余讶以问翁，翁应曰 : 此天下奇才也，吾无以位置之，是以不敢见”。⑥ 则康有为上书工部失败后，曾经张荫桓介绍见翁，想通过翁上书，但遭到翁拒绝，并未见翁。

虽然康未能见到翁，但他既“投以书告归”，则书中理当告知翁自己将于何时离京南归，甚至可能留下“上清帝第五书”，于是就有了康自编年谱所记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康出京前“常熟来留行”的一幕。⑦ 在半年后的一封家书中，康也有“去年归则为宰相所留”之说。⑧ 更加重要的是，翁挽留康次日，即有给事中高燮曾奏荐康有为出洋之事。查高燮曾十一月十九日共上一折两片，其中附片二系保举康有为出洋参加弭兵会，称“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希望光绪帝“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臣，用示郑重”。光绪帝当即降旨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⑨ 而翁当天日记亦有“高御史燮曾保康有为入瑞典弭兵会，交总署酌核办理”的记述。⑩ 显然，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发生的事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孔祥吉怀疑高燮曾奏荐是翁、康密谋的结果，且高的附片系康贿买而得，⑪ 是有道理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根据翁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大致勾勒出翁、康见面谋划的情景：当天一早，翁先与诸军机大臣入宫见起，在讨论胶州湾事件时，光绪帝传达了慈禧太后不满对德交涉，指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的“慈谕”。这让身为交涉负责人的翁同龢顿觉“愧悔无地”，于是开始发泄不满，陈述“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

---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5 册，第 2878 页。

② 翁同龢:《松禅自订年谱》，谢俊美编:《翁同龢集（增订本）》第 4 册，第 1698 页。

③《记客述翁故相遗事》，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03 页。

④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07 页。按，原编者说明，此书撰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约 1898 年 1 月，而实际至迟撰于十一月。参阅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 年，第 10 页。

⑤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33、137 页。

⑥ 王庆保、曹景郕 :《驿舍探幽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492 页。

⑦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33、137−138 页。

⑧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成文出版社，1978 年，第 776 页。

⑨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年，第 427 页。

⑩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068 页。

⑪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 168−172 页。

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见起只有三刻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①] 出城原因即因康将要离京（通过康留书得知）。心情愤懑的翁向康讲述了对德交涉的困难情形，康则依《上清帝第五书》所述，向翁提议参加“弭兵会”，而其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希望光绪帝“特予召对”，从而有机会发表政见。翁是否看出康的真正用意难以判断，但至少从应对“胶难”出发，翁认可了康的建议，并对康进行了挽留。于是，康很快拟好奏片，然后“由杨锐交高氏递上”。[②] 故康自编年谱有“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的记述。[③] 康后来所作《怀翁常熟去国》诗题记，亦称“常熟已力荐于上”。[④] 翁对康先拒后荐的态度变化是张荫桓没有料到的，故有“后竟奏荐朝廷，拟召见”[⑤] 之说。

总理衙门奉旨后就高燮曾的保康附片进行了讨论。总署大臣许应骙反对召见，“阻之于恭邸，常熟再持之”，[⑥] 于是恭亲王建议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已，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果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论。众曰：诺。”[⑦] 康有为对这一安排极为满意，在致康广仁信中称：“总署延见，问治天下之故，乃自有总署以来□无，举朝以为旷典，此实恭邸中许应骙之言沮召见，而改作大臣□□也。”[⑧] 但因“年节伊迩，各署多冗，无暇及此”，对谈迟至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才进行。[⑨] 可以说，许应骙的阻挠和恭亲王的建议反而为康有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向朝廷高层当面阐述政见的机会。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胶州湾事件给了慈禧太后、光绪帝和翁同龢极大的刺激。从前引十一月十八日翁所记光绪帝转述慈禧太后不满对德交涉，归咎于大臣“不能整饬，坐致此辱”来看，慈禧太后对朝廷现状是很不满意的。而这对有意变法的光绪帝来说，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促动。因此，就在总署约见康有为前数日，即十二月廿四日，光绪帝在召见诸臣时，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结果恭亲王及诸臣皆“默然”，只有翁同龢“颇有敷对”，“谓从内政根本起”。光绪帝遂令其“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材之旨，又拟饬部院诸臣不得延阁官事旨”。这几道谕旨应当就是翁同龢“敷对”的变法内容。当天退朝后，翁同龢在总署见到赫德，后者感慨“四十年劝中国自强，乃因循至此”，引得翁亦不禁感叹：“其言绝痛！有心哉，斯人也！”[⑩] 以上史实说明，总署约见康有为前，慈禧太后对现状已很不满意，光绪帝和翁同龢则事实上已在酝酿“变法”，因此，这次约见必然会受到光绪帝与翁同龢特别关注。

总署与康有为的对谈从正月初三日下午三时开始，至天黑上灯乃散，参加者有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⑪] 翁当天记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灯后归，愤甚，惫甚。”[⑫]“狂甚”二字带有贬义，汤志钧认为该二字在日记该行的最下端，又挤又小，当系添出，[⑬] 但从康有为当天的表现来看，完全可以用这二字评判。康本人也曾于戊戌八月底向港报记者讲述过此次对谈情形，记者问：“你的建议被接受的经过是怎样的？”康答：“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白的表示，但我可以看得出大多数是反对维新的。总督荣禄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改变祖宗的成法？我的答复

---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067 页。

② 马忠文：《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探析——兼论戊戌维新前后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与活动》，《学术交流》1998 年第 1 期。

③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38 页。

④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12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88 页。

⑤ 王庆保、曹景郕 :《驿舍探幽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492 页。

⑥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38 页。

⑦⑧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492 页。

⑧⑩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 775 页。

⑩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081 页。

⑫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086 页。

⑬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99 页。

是：我们的祖宗并没有一个总理衙门，难道这不已经是一个改革吗？我建议的第一件事情是：中国应当有一个组织适宜的司法制度，必须聘请一个外国人和我自己以及其他的人，共同改订法律和政府各部门的组织。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是一切改良和维新政策的基础。”① 稍后，康自编年谱亦载，当时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康答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康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答：“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② 显然，康不仅“狂甚”，而且其改革主张已触及朝廷的根本制度。茅海建认为“此时康尚未大用，正谋求前程，即便与荣禄意见不一，也未必当面露出锋芒。荣为少年得志之人……不太会看得起康，对康改革官制的说词很难有兴趣，故先行离去。但荣处世为人甚精密，似不会去主动攻康，提出‘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命题”。③ 这一看法似欠考虑，既不符合康有为“狂生”的特点，也不符合对谈情形。荣禄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并非“主动攻康”，而是在总署大臣询问康有为“中国应如何善后，应如何变法，其先后缓急□□”④ 过程中，因康有为“狂甚”而引发，结果又被康怼了回去。至于翁同龢“愤甚”，则可能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既有对奕䜣、奕劻缺席如此重要场合的不满，又有对荣禄坚持“祖宗之法”中途离去的不满，还有对康有为“狂甚”的不满，毕竟康是在翁支持下才获得此次对谈机会，荣禄、刚毅素来与翁不协，⑤ 康开罪荣禄对翁没有任何益处。

总署对谈后，据康有为致康广仁信，谓：“越日常熟托樵野来云：上急欲变法，恭邸亦有□□吾《日本变政记》及吾条陈，上乃宣促速上。吾顷拟抄此书及条陈同上，□□□启圣，亦千载一时之机也。”⑥ 自编年谱亦谓：“阅日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上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法考》及《俄彼得变政记》”。⑦ 尽管有研究者认为康有为所谓“上命召见”“上乃令条陈”等等说法不实，⑧ 但事实上光绪帝不可能不知道总署传见康有为，也不可能不关注这件事，故对谈后翁同龢请康有为将其主张进一步形成文字，以便向光绪帝汇报，应属事实。于是就有了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之举，扼要阐述变法纲领，提出模仿日本，“大集群臣于天坛，或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宣布维新更始，以一人心；设上书所于午门，许天下士民上书，群僚言事无须由堂官代递；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商榷旧制新政，草定章程；于中央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十二分局，直省每道设民政局，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以推行新政。⑨ 然而，该呈直至二月十九日总理衙门才代奏。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续递条陈并进呈《俄彼得变政记》，以及二月二十七日再递条陈，总署也迟至三月初三日才一并代奏。⑩ 这种情况说明，总署代递康有为条陈、书籍很可能遇到了来自许应骙等人的阻力，但因为有翁同龢等支持，最终还是能够上

---

①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 1142 页。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140 页。
③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 291–292 页。
④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 775 页。
⑤ 《黄绍箕致父黄体芳书札》（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文献》2006 年第 4 期。
⑥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 775 页。
⑦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140 页。
⑧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 295–297 页。
⑨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97–202 页。
⑩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 552、570 页。

达。三月二十日，康有为又递条陈两件并附呈《日本变政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三书，总署于三月二十三日代奏，光绪帝当即命翁同龢将康有为二月二十日以来及当天所递所有条陈、书籍皆呈慈览。① 此次总署得以迅速代奏，可能与许应骙正好因病请假不无关系。②

然而，翁、康关系不久就逐渐变得微妙起来。由于对康新著《孔子改制考》不满，两人关系渐生变化，翁开始有意疏远康。据四月初七日翁日记："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分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四月初八日复记："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③ 从光绪帝反问翁同龢"前此何以不说"康有为"居心叵测"，可反证翁同龢此前给光绪帝讲述的康有为的形象完全是正面的。现在因为翁、康关系生变，连带导致翁与光绪帝之间亦发生不快，盖康的变法主张此时已引起光绪帝高度重视，而翁对康的看法却趋于负面，甚至因康之著作怀疑康之用心。至于翁反感《孔子改制考》的缘由，或许可用罗倬汉的一段分析来解释，他说：

> 《改制考》是说上古茫昧无稽，现在所有一切古代传说都是春秋以后诸子造出来的，他叫这种为托古改制。诸子没有一个不改制的，也就没有一个不托古的。孔子的六经是托古改制的著作。我们看《论语》，孔子明说他是"述而不作"，康氏偏说他是"作"；又明说他"信而好古"，康氏偏说他"托古"。这还不要紧，说孔子托古改制，不是说孔子先已不老实，假造了尧、舜、禹、汤、文、武来骗人吗？这不是随便说经的问题，是关于孔子人格的问题。还不止此，一切圣贤都是骗子，是先存着一种不老实的思想来教世间，那人类还有什么标准可说？一切人都可肆言无忌，乱生是非了。这和忠孝尽职的思想是根本冲突的，这真是到了著书者的心术问题了……《改制考》虽然把孔子算作教主，"神明圣王"，但骨子里却动摇了孔子的人格，弄坏了学者的心术。翁氏读康书，对于《伪经考》，还只骂他"野狐"，而对于《改制考》却说他"居心叵测"，即是这个缘故。④

当然，《孔子改制考》倡言"民权"，批评专制，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更是翁同龢无法接受的。其时适逢恭亲王奕䜣于四月初十日去世，康有为觉得这是推动改革的好时机，于是"上书常熟，促其亟变法，勿失时"，但翁已经无意与康为伍，反而以康"谤鼎沸"，希望其回广东去。⑤

以上史实清楚表明，翁同龢荐康乃丁酉冬至戊戌春间之事，此后因翁、康关系生变，直至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颁发，翁已不可能再有荐康之举。而在"明定国是诏"颁发后仅仅三日，翁即被开缺。戊戌政变后清廷所颁谕旨说翁"今春力陈变法……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⑥ 所指向的也是"明定国是诏"颁发前翁之荐康。所谓"今春"，具体言之，即戊戌闰三月十五日之前，盖闰三月十五日立夏，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颁发时已过夏至了。⑦

①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 606 页；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112 页。
② 马忠文：《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③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128 页。
④ 罗倬汉：《谈翁同龢罢职事》，《读书通讯》第 29 期（1943 年）。
⑤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43–144 页。
⑥《清德宗实录》卷 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
⑦ 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中华书局，1985 年，第 765 页。

三、光绪帝对翁、张态度的变化及张对康的支持

那么，在失去翁同龢这个有力人物的支持后，康有为为什么在百日维新开始后仍能受到光绪帝重用呢？这就不能不注意朝中支持康有为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户部侍郎兼总署大臣张荫桓。

张荫桓非科甲出身，他早岁纳赀报捐知县，久为山东巡抚、湖广总督幕僚，迭保至道员，擢任山东盐运使，升署按察使。光绪八年开缺，赏三品卿衔，在总署学习行走。光绪十一年奉命为出使美、西、秘三国大臣。光绪十六年返国后复以太仆寺卿、大理寺卿等兼总署大臣。光绪十八年起以户部侍郎兼总署大臣。① 早期在总署的历练和后来的出使经历使其成为总署最熟谙外交者。俄国驻华公使曾笑言："初谓贵署仅君一人耳。" ② 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的夫人也在日记中写道："恭亲王看上去好像是这个集团的领袖，但他却沉溺于鸦片与女色，而把很多事情都交给了曾经在华盛顿待过的荣禄（应为张荫桓——引者），后者看上去是整个这群人当中最文明开化的一个。" ③ 张亦自视甚高，曾于光绪二十一年冬接待李提摩太时告诉后者："中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衰弱无能，都是因为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龢对外国事物的无知……整个中国懂得外交工作的，唯有曾担任驻美公使的他自己和李鸿章二人而已。外务部的事务都是他一人鼎力维持，别的人不过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而已。" ④

康有为与张荫桓同为广东南海人，虽有辈分之差，但私交颇深。至迟在光绪二十年春康有为到京参加恩科会试时，两人已有密切交往，⑤ 早于翁、康正式交往，而且翁、康建立关系极有可能还是通过张荫桓。比如，张的同乡叶恭绰在《读张樵野〈铁画楼集〉》诗序中就说："康长素之出，实由樵野荐之于翁叔平，翁荐之于光绪，故戊戌变政，樵野实其原动。"⑥ 沃丘仲子在翁同龢小传中亦说："当马关约签印，帝挥涕向之，因慷慨言：愿求贤士、更敝政、图富强，期五年复仇。适康有为方数上书，皆言变法，陈覆亡之惨，语颇沉痛，张荫桓荐之，同龢以为不世才，密为帝言。及德踞胶澳，俄、法交乘，帝决更国是，更力荐有为。"⑦ 张是否在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上书时即向翁同龢推荐过康，以及翁是否在当时就密向光绪帝介绍过康，均待查证，但在光绪二十三年德踞胶澳后，张介绍康通过翁上书以及翁先拒后荐，则已如上述，可为印证。那么，张荫桓为何不直接将康介绍给光绪帝，而要先介绍给翁同龢呢？最主要还是因为翁久为帝师，彼时资望、地位远高于张，且与光绪帝接触机会更多，通过翁之介绍，康更容易受到光绪帝重视，同时还可避免给人留下同乡结党的口实。黄濬所谓"以予所知，康南海之得进于德宗，实樵野所密荐，常熟诇知德宗意，始具折保康"云云，⑧ 其实未能窥破其中利害关系，与翁、康密谋通过高燮曾荐康的事实亦不相符。

至于翁、张二人，至迟在光绪十年就已相识，翁对张颇为赏识，其日记屡屡反映这一点，如说张"熟海疆情形，其言切实"，又说"此人才调究胜于吾"，对其诗歌亦赞叹不已，认为

---

① 何炳棣：《张荫桓事迹》，《清华学报》第 13 卷第 1 期（1941 年）；钱实甫：《清季职官年表》第 4 册，中华书局，2005 年，第 3023 页。

②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1988 年影印本，第 108 页。

③ 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秦俊峰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17 页。

④ 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 167−168 页。

⑤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5 年，第 519、527、533、536 页。

⑥ 叶恭绰著，王卫星整理：《叶恭绰全集》下册，凤凰出版社，2019 年，第 1368 页。

⑦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第 106 页。

⑧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年，第 466 页。

“真绝才也”。[①] 张辈分小于翁，但先于翁入总署，据吴永言：“张公……在总署多年，尤练达外势，翁常熟当国时，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翁名辈远在张上，而函中乃署称‘吾兄’‘我兄’，有时竟称‘吾师’，其推崇倾倒，殆已臻于极地。今张氏裒辑此项手札，多至数十巨册，现尚有八册存予处，其当时之亲密可想。”[②] 谭延闿也曾收藏甲午至戊戌间翁同龢致张荫桓书札百余纸，可证两人的确过从甚密。[③] 更重要的是，两人都主张变法，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曰：“其时廷臣主变法者为翁同龢、张荫桓，主守旧者为徐桐、刚毅，主变法而专师西人练兵、制械、通商、开矿者为奕䜣、李鸿藻、荣禄，余则依违于二者之间。”[④] 而翁地位高于张，至迟在戊戌正月初三日总署约见康有为对谈时，对康之进用而言，翁可起到的作用远比张大。在光绪帝急于变法的情况下，翁也比张更加关心此次对谈，其日记不仅简要记述了康有为发表的主要的变法主张，而且表达了自己复杂的心情；而张的日记完全未记内容，仅以“长素高论”[⑤] 四字带过。戊戌政变后谈及此次对谈，张的说法是，康“语未终，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⑥] 虽然目的在淡化其与康有为的关系，但也反映了其当时并不是主导者或关键角色。从康有为事后致康广仁信中提及翁同龢托张荫桓传话康有为，请其条陈所见并进呈书籍来看，当时的张荫桓的确只是配角。

不过，此后随着翁、康关系生变，以及光绪帝明显表现出重张倾向，康有为的主要支持者也由翁同龢逐渐转为张荫桓。导致光绪帝对翁、张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是戊戌春德国亲王亨利即将来访，以及新任俄国驻华公使巴甫洛夫将要递交国书。光绪帝对这两件事非常重视，因张荫桓曾任驻外公使数年，不久前又赴英祝贺其国王在位六十年，自然在接待外宾的地点、礼节等问题上很重视其意见，为此在戊戌三月前后多次单独召见张荫桓，甚至受张之影响欲“尽用西礼”。[⑦] 而翁同龢则因坚持传统礼仪，数次与光绪帝产生分歧，遭到光绪帝批驳。[⑧] 这就不仅使翁与光绪帝之间隔阂渐深，而且引起翁对张的不满，如三月十五日俄使递交国书后，翁于日记中写道：“此次仪节，庆邸不知，臣等亦不知，真辟门达聪之意矣。”[⑨] 明显指向张荫桓，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萧一山甚至认为，翁同龢去职乃张荫桓“排而去之”。[⑩]

更值得重视的是，光绪帝频繁召见张荫桓的时候，也正是康有为阐述变法的条陈和书籍不时进呈的时候，这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梁启超谓张荫桓“久游西国，皇上屡问以西法新政”，[⑪] 其实已微露内幕。苏继祖则明确指出，“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启诱圣聪，多赖其力”。[⑫] 李鸿藻的外孙祁景颐更进一步透露张荫桓“翕热功名，又恃两宫俱有援系，于德宗召见时私有所陈，兼进新学书籍，如康南海之进身，外传翁文恭所保，其实由于侍郎密荐也”。[⑬] 此说否定翁同龢在康有为进用过程中曾起过作用，有违事实，但强调张荫桓在康有为进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则符合实情。四月初七

---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4 册，第 1832 页；第 5 册，第 2852 页；第 6 册，第 3079 页。

② 吴永口述，刘志襄记，鄢昆标点：《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 年，第 21–22 页。

③ 刘建强编著：《谭延闿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205 页。

④ 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崇文书局，1926 年，第 96 页。

⑤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下册，第 565 页。

⑥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492 页。

⑦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下册，第 570、572、580–581、583、584、588 页。

⑧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108–3109、3133 页；翁同龢：《松禅自订年谱》，谢俊美编：《翁同龢集（增订本）》第 4 册，第 1715 页。

⑨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109 页。

⑩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4 册，第 2094 页。

⑪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 90 页。

⑫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331 页。

⑬ 祁景颐：《𫗦谷亭随笔》，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 13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24 页。

日、初八日翁同龢拒绝呈递康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除了不满《孔子改制考》和康之为人外，不能排除翁同龢还欲借此表达对光绪帝越来越重视张荫桓的不满，其所谓“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很能表达这种情绪，而光绪帝坚持要翁同龢传旨张荫桓转索康书，则表示不会改变自己对张荫桓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决心推行变法的光绪帝来说，张荫桓的重要性已经超过翁同龢。故当四月初十日王鹏运上奏弹劾翁、张“朋谋纳赂”后，光绪帝对翁同龢没有与张荫桓共同应对表示不满，怀疑翁、张“有隙”，在四月二十四日见起时，要求翁同龢对张荫桓“推重，力保之”，可见其何等倚重张荫桓。而原本与张关系密切的翁同龢此时却不认为自己与张荫桓是一路人，称王鹏运之劾是“薰犹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人”，竭力将自己与张区隔，并在光绪前“据理力陈”，表示“不敢阿附”，“语特长”。[①] 光绪帝与翁同龢的隔阂至此已很难消除。黄彰健谓“光绪在四月二十四日尚欲翁推重张荫桓，则光绪并未因王鹏运此折而减少他对翁、张二人的信任”，[②] 此种解释似未能准确捕捉到光绪帝与翁、张关系的变化。

光绪帝倚重张荫桓，意味着翁、康关系虽然生变，但因张、康关系紧密，特别是张、康重视西学与光绪帝的变法趋向契合，因此康有为只会更加受到张荫桓支持和光绪帝重视。郭则沄所谓“康有为初规变法，所著及封奏皆由张樵野侍郎代进”，[③] 以及魏元旷所谓“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④] 也就不难理解。“明定国是诏”颁布后两日，即四月二十五日，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奉旨康、张于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⑤] 张荫桓对此即予以支持，不仅于当天日记中记录了谕旨，而且在四月二十七日康有为到颐和园准备次日接受召见时，还与康有为、张元济“共晚饭”，当晚康所住“户部公所”显然也是张荫桓安排的。[⑥] 从这两天张荫桓的日记事后都有涂抹痕迹来看，可以想象他曾如何尽力为康有为接受召见出谋划策。而就在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光绪帝降下朱笔特谕，“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中“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云云，[⑦] 很易让人联想到翁对康有为前后态度的变化及其与光绪帝之间产生的种种隔阂。翁同龢被开缺，预示着次日接受召见的康有为将会被重用，因翁的变法主张保守而康则更为趋新，两者共存，变法将难以推行。[⑧] 光绪帝既然决意变法，且憾于“大臣之不明新学”，[⑨] 便只能忍痛牺牲翁；且翁当时正遭受弹劾，“开缺”其实也是对翁的“保全”。慈禧太后此时也是支持变法的，颁发“明定国是诏”就是在光绪帝“奉慈谕”后才落实，[⑩] 但慈禧太后对奕䜣死后翁在中枢权位更重不免有忧，因此不会反对翁离去，而对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来说，就更乐见翁离去。[⑪]

---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129、3133 页。

②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第 163 页。

③ 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4 辑，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16 页。

④ 魏元旷：《魏氏全书 · 坚冰志（节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312 页。

⑤《清德宗实录》卷 41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丁未。

⑥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下册，第 600、601 页。

⑦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134 页。

⑧ 尽管“明定国是诏”还是由翁同龢拟定的，但从光绪帝强调“今宜专讲西学”，而翁同龢强调“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132 页），可知两人分歧明显。

⑨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 2 卷，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195 页。

⑩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132 页。

⑪ 翁同龢被开缺的隐情，维新派很难公开道出，故梁启超在写给夏曾佑的信中说：“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俟见时详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22 页）后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把翁同龢被逐说成慈禧太后与荣禄密谋反对变法的结果，有掩盖真相之嫌。而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罗倬汉就提出质疑：“如果按照《戊戌政变记》说是西后迫令德宗的，但尤其要注目的康有为，何以翁去后一日，遂得觐见，西后反不加干涉呢？”（罗倬汉：《谈翁同龢罢职事》，《读书通讯》第 29 期 [1941 年]）

果然，四月二十八日入对时，康有为与光绪帝对谈颇为浃洽，[①]当天光绪帝即降旨，著工部主事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②]这样，康就成为张荫桓在总署直接的下属，此时的张、康关系可以说最为深密。康的同年进士胡思敬称，康“进用之初，唯张荫桓以同里日与之游，常以总署密情相饷，二人称服泰西，私相褒重，尚书许应骙、副都御史杨颐以下，视之蔑如也”。[③]康、张的政敌文悌攻击康“暗营保荐以邀登进”，“其行踪诡秘，恒于深夜至锡拉胡同张大人处住宿，盖户部侍郎张荫桓与康有为同县同乡，交深情密”。[④]就连当时来华考察和采访的德国《法兰克福报》驻中国记者鲍尔·戈尔德曼也知道，“皇帝的宠臣康有为是张荫桓家的常客”。[⑤]苏继祖则于政变后通过调查向世人披露了更深的内幕：“康于召见后，五月底曾蒙私见一次，因大费周折，不敢再见矣；而手谕不时下颁，说帖时有进呈，南海张侍郎曾代传递二三次，皆纸笔所不能达者。八月事变后，传递之太监二名、守宫门之太监三名皆杖杀之，张侍郎之得罪，此其一端。”[⑥]张荫桓是否曾经安排光绪帝与康有为在五月底私见一次，尚待进一步研究，然依光绪帝对张荫桓的信任和张、康关系，由张居中传递手谕、说帖，并不出人意外。候补四品京堂王照所谓“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⑦]“是时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大臣以上”，[⑧]以及“南海为张荫桓所蔽”云云，[⑨]所反映的都是这一段的情况。

只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历遭贻縠、王廷相、徐桐、于荫霖、王鹏运、胡孚宸六折弹劾的情况下，虽然光绪帝对张荫桓仍然保持信任，曾于五月初六日令礼亲王传谕张荫桓“不必忧虑”，但张已产生“引退”想法，[⑩]其对康有为变法的支持也谨慎起来。比如康正月初八日所上请开制度局条陈（即《上清帝第六书》），于二月十九日上奏后奉旨交总署议复，虽然屡奉谕旨严催，但直至五月中旬才奏复，且奏复结果是尽行驳回。[⑪]光绪帝为此召见张荫桓，责之曰：“汝等尽驳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办乎？”张伏地叩头曰：“此事重大，非臣数人所能决，请再派枢臣会议。”[⑫]光绪帝遂令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切实筹议具奏。但六月十五日奏复时，也只是赞同一些细枝末节的改革，其余重要建议仍被驳回，[⑬]特别是设立制度局的建议未能批准，等于否定了维新派最核心的改革主张。由于张荫桓的明哲保身，其与康的关系亦逐渐疏远，而与守旧势力则交往日密。[⑭]先后失去翁、张支持的康党，此后不得不在危急关头寻求袁世凯的帮助，亦有不得已的原因。

四、余论

翁同龢与张荫桓均对戊戌康有为进用起过重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先是翁同龢在胶州

---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44–147 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 41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庚戌。
③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375 页。
④ 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485、487 页。
⑤ 苏芙、龚荷花、苏惠民编译：《走向没落的“天朝”——德国人看大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58 页。
⑥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335 页。
⑦ 王照：《礼部代递奏稿》（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按语，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355 页。
⑧ 王照：《劾张荫桓奏稿》（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按语，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356 页。
⑨ 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选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359 页。
⑩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 603–604 页。
⑪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 年，第 7–8 页。
⑫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 18 页。
⑬ 《军机大臣世铎等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 9–11 页。
⑭ 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43–246 页。

湾事件交涉中受辱和光绪帝急于变法的背景下，借高燮曾保康奏片支持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虽因许应骙等人反对未能达到目的，但通过总署约见康有为对谈及随后向光绪帝呈递康有为条陈及书籍，成功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为此后光绪帝重用康有为做好了铺垫。在此过程中，张荫桓亦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而随着翁、康疏远及光绪帝对张荫桓的倚重超过翁同龢，张对康的支持作用逐渐凸显。“明定国是诏”颁布及翁被开缺后，张、康交往更加深密，百日维新得以展开，与张对康的支持分不开。

不过，在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严厉镇压康党的情况下，不论翁同龢还是张荫桓，都轻易不会承认自己与康有为的关系。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清廷降旨追加对翁同龢的处罚，“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谕旨中有“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等语，[①] 翁同龢的反应还仅是“伏读感泣而已”，[②] 没有表示异议。迨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所颁缉拿康、梁的谕旨又提到“翁同龢极荐康有为，并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时，[③] 翁同龢开始在日记中为自己辩护：“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如何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因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④] 翁同龢的确是在康有为被命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前一天被开缺，也的确在四月初七日、初八日曾拒绝光绪帝要他向康有为索书的要求，但光绪帝当时索要的并非新书，而是三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就呈递过的，因当时已转呈慈览，故光绪帝要翁同龢再索一份，翁谓“不知书中所言如何也”，实属谎言。同时，翁提及康书最后由张荫桓索得，虽属事实，但实有诿过于张的用心。而张荫桓则说，“兹祸之起，康有为固非罪魁，实翁常熟酿成之”，他举胶州湾事变发生后康有为上书的例子，说当时康请他介绍见翁，翁本已拒绝，“后竟奏荐朝廷，拟召见”，这才有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总署召康对谈，[⑤] 也才有后来康有为进一步呈递条陈及书籍。张荫桓显然也是意图诿过于翁同龢，但其所言毕竟属实，让人无法反驳。

尚须指出的是，有一种说法，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谕旨是刚毅的意思。[⑥] 有研究者据此进一步研究，提出“其才胜臣百倍”应是戊戌四月初七日光绪帝令翁同龢进呈康书时所讲的话，原话应是“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刚毅拟旨时为陷害翁氏，断章取义，将“其才胜臣十倍”改为“百倍”，作为翁氏“荐康”的证据，并将“其心叵测”一句隐去不言。[⑦] 此说恐难成立，因该谕旨其实是在光绪帝“朱笔”基础上扩写的，“朱笔”已有“今春又密保康有为”之语。[⑧] 如此则翁是否讲过“其才胜臣十倍”或“百倍”的话，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谕旨中“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完全是按照光绪帝“朱笔”的意思，足以说明翁确曾保荐过康。退一步言，假使翁氏讲过“其才胜臣十倍”或“百倍”的话，也应当是在戊戌二、三月向光绪帝呈递康有为条陈或书籍时所讲，而不大可能是四月初七日拒绝向光绪呈递康书时所讲，因二、三月呈递康书或条陈是公事，刚毅作为军机大臣，尚有一丝可能知道翁讲了什么，而四月初七日翁见光绪帝是独对，刚毅不可能知道翁对光绪帝讲了什么。就康、梁的记述来看，也

① 《清德宗实录》卷 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

②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176 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 455，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壬戌。

④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6 册，第 3241 页。

⑤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492 页。

⑥ 协修王崇烈拟：《翁同龢列传》，清史馆本，故传 006355 号，第 15 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⑦ 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质疑——从“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说起”》，《史林》1999 年第 3 期。

⑧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 422–424 页。

都指出翁同龢是在向光绪帝呈递康书过程中向光绪帝表示“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①]

一言以蔽之，既往学界将翁同龢“荐康”与张荫桓“荐康”两说对立，实际上割裂了历史。戊戌康有为得以进用是翁、张先后支持的结果，萧一山所谓“有为之受知于帝，由于同龢，其向用变法，则由于荫桓”,[②] 可谓确当。翁、康交往其实并不密切，其对康的支持虽然也有秘密的一面，但基本上是公开的；而张、康关系之深密几乎尽人皆知，但其对康的支持却更多是隐秘的，这或许与其当时受到诸多政敌攻击有关。黄濬曰：“或疑南海年谱中，言常熟者多于樵野，以为南海纯得常熟之力，此实大误。南海来京，主樵野，此事瘿莽、孺博皆言之。常熟负重望，又有知己之感，故数言之；樵野结纳深，而为谋主，故不数言之也。”[③] 瘿莽、孺博即康有为弟子罗惇曧、麦孟华，他们最了解内情，黄濬借二人所言，意在说明张、康关系其实比翁、康关系更深一层，康自编年谱之所以很少提到张荫桓，是因张为康背后“谋主”，故不便多言。但黄濬所言又恰恰证明翁、张在戊戌康有为进用过程中都曾起过作用，只不过两人的角色有所不同而已。

References

He Bingdi. “Zhang Yinhuan shiji” (Zhang Yinhuan’s story). *Qinghuaxuebao*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13, (1943).

Heyking, Elisabeth von. *Deguo gongshi furen riji* (Diary of the German Minister’s wife). Fuzhou: Fujian jiaoyu chubanshe, 2012.

Huang Zhangjian. *Wuxu bianfashi yanjiu*(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2007.

Kong Xiangji and Yujiro Muratu. “Wengwengonggong riji gaoben yukanben zhi bijiao:jianlun Weng Tonghe dui riji de shangai” (Journal of Weng Tonghe：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nuscripts and the published version). *Lishi yanjiu* (Historical Research) 3 (2004).

Kong Xiangji. *Kang Youwei bianfa zouyi yanjiu* (Study on Kang Youwei’s memorials on the reform). shenyang: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1988.

Kong Xiangji. *Qingren riji yanjiu*(Study on diaries in Qing Dynas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2008.

Luo Zhuohan. “Tan Weng Tonghe bazhishi” (Discussion on Weng Tonghe’s dismissal from Office), *Dushu tongxun* (Reading Communication). 29 (1941).

Kong Xiangji.*WanQing yiwen congkao:yi wuxuweixin weizhongxin*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anecdot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Centering o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Chengdu: Bashu shushe,1998.

Ma Zhongwen. “Weng Tonghe jianKangshuo zhiyi: cong Kang Youwei zhi cai shengchenbaibei shuoqi” (Question to the Theory of Wong Tonghe Recommending Kang Youwei: Starting from “Kang Youwei’s talent is a hundred times better than mine”). *Shilin* (Historical Review) 3 (1999).

Ma Zhongwen. “Zhang Yinhuan Weng Tonghe yu wuxunian Kang Youwei jinyong zhi guanxi” (Zhang Yinhuan and Weng Tonghe’s relations with Kang Youwei’s promotion in 1898). *Jindaishi yanjiu*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1 (2012).

Mao Haijian. *Cong Jiawu dao Wuxu: Kang Youwei Woshi jianzhu* (From Jiawu to Wuxu: Identification and annotation of Kang Youwei’s Woshi).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2009.

Mao Haijian. “Kang Youwei yu Mibinghui: jianlun Weng Tonghe jian Kang Youwei shuo” (Kang Youwei and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 Weng Tonghe’s recommendation of Kang Youwei). *Qingshiyanjiu* (The Qing

① 康有为：《翁文恭书〈易林〉书后》,《万木草堂遗稿》，成文出版社，1978 年，第 193 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 10 页。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4 册，第 2102 页。

③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 466 页。

History Journal) 6 (2022)

Richard, Timothy. *Litimotai zaihua huiyilu* (Timothy Richard's Memoirs in China). Nanjing: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2018.

Su Fu, Gong Hehua and Su Huimin. *Zouxiang moluo de Tianchao:Deguoren kan daQing* (The Declining "Celestial Empire": The Qing Empire in German eyes).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 2013.

Tang Zhijun. "Kang Youwei shang Qingdi diyishu xintan: Weng Tonghe zhaichao shouji duhou" (The new exploration of Kang Youwei's "First Memorial to the Qing Emperor": After reading Weng Tonghe's handwritten copy). *Xueshu yuekan* (Academic Monthly) 7 (2000).

Woqiuzhongzi. *Jindai mingren xiaozhuan* (Brief biography of celebrities in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guo shudian,1988.

Xiao Yishan. *Qing dai tong shi* (General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86.

The Influences of Weng Tonghe and Zhang Yinhuan on Emperor Guangxu's Appointment of Kang Youwei's in 1898

SHANG Xiaom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sxm@pku.edu.cn)

Abstract: The theories that Weng Tonghe recommended Kang Youwei, or that Zhang Yinhuan recommended Kang Youwei are both onesided. In fact, from the winter of 1897 to the spring of 1898, Weng Tonghe suggested Kang Youwei to the imperial court out of consideration for reform. This recommendatio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mperor Guangxu, who was eager for reform, and who repeatedly ordered the Zongli Yamen to submit Kang Youwei's articles and books,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Kang's appointment. In the meantime, Zhang Yinhuan, who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Kang, also played a supporting role, but not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spring of 1898 Weng Tonghe distanced himself from Kang because he was dissatisfied with Kang's "*A Study of Confucius as a Reformer*". Meanhwhile, Emperor Guangxu was estranged from Weng because of Weng's reluctance to continue to submit Kang's book and opposition to the reform of diplomatic etiquette. Therefore, Zhang Yinhuan, who valued Western learning and who was familiar with foreign affairs, gradually became the Minister Emperor Guangxu relied on most to implement reforms. After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due to Weng's removal, Kang's main supporter was no longer Weng but Zhang. Comparatively, Zhang's support for Kang was more secretive than Weng's support for Kang. Therefore, when Kang and Liang later describe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hey talked more about Weng and less about Zhang.

Keywords: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Emperor Guangxu, Kang Youwei, Weng Tonghe, Zhang Yinhuan